

贵州省社会学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社会学传承创新与 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研究

主 编 庄 勇

副主编 罗俊松



贵州省社会学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社会学传承创新与 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研究

主 编 庄 勇
副主编 罗俊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社会学传承创新与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研究 / 庄勇主编.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81126-676-4

I. ①社… II. ①庄… III. ①社会发展 - 贵州省 - 文集 IV. ①D67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0791号

社会学传承创新与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研究

主 编: 庄 勇

副 主 编: 罗俊松

责任编辑: 滕 芸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

字 数: 580 千

版 次: 2014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676-4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5981027

编者的话

2012年初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对贵州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和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对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这对于贵州省学界而言,其影响同样是重大而深远的。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贵州省社会学学界的同仁们倍受鼓舞,精神振奋,积极投身于相关研究工作之中,将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与贵州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相结合。鉴于此,2012年度贵州省社会学学术年会的主题定为“加强社会学传承创新,推动贵州社会跨越发展”,并于2012年11月23日在贵州大学成功召开。全省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近1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年会。

本次年会收到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征文共计142篇,内容涉及“十八大”精神与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社会工作与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研究、社会学理论传承创新研究等社会学领域的前沿课题。如此数量大、质量高的稿件反映出与会专家学者及师生们对推动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蓬勃热情,更反映出了与会各位同仁科研水平的长足进步。

由于篇幅有限,本着紧扣主题、求真务实的原则,为贵州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建言献策为目标,经过编者对投稿稿件的认真阅读,共甄选论文85篇,汇集成册。论文多维度、多视角聚焦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探究,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又有对社会实践的研究。本文集按论文内容分为社会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社工理论与实务、社会管理与实践、文化传承与发展、“三农”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组织研究共计七个板块。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贵州大学法学院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者

2013年9月25日

目 录

社会学理论发展与创新

我国农村女性高自杀率的社会文化因素辨析	李建军 / 3
贵州省人口死因分析	陆卫群 / 11
贵州速度与我省创新型科技人才团队建设问题及对策建议	张玉林 / 20
共青团融入社会生活问题研究	蒋红霞 赵栋昌 / 23
边缘化的身体及身体排斥——以城市环卫农民工为例	康红梅 / 28
联系与互动：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界	陈立勇 / 33
试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王国勇 / 39
乡村旅游扶贫属性的社会学分析——以天龙乡村旅游为例	陈 斌 / 45
浅论家庭功能的理性回归——基于贫困山区“留守儿童”若差异性的实证研究	李 琳 / 53
以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统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以贵州省黔南州凯里市为例	周 恒, 王 唤 / 61
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看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张晴晴 / 68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证研究——以贵州大学北校区为个案	夏 旺 / 73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的趋势分析	杨 欢 / 79
浅谈青少年文化的“非主流”现象——以“杀马特”网络家族为例	刘冲亚 / 86
社会共识与贵州省跨越式发展	徐建宇 / 91
浅谈中国城乡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基于布迪厄研究视角的启示	王亚奇 / 96
科学发展观推动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的路径分析	王光召 / 100
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对社会稳定的必要性分析	李琦江 / 104
贵州工业化发展现状分析及其对策研究——推进花溪区城乡社会一体化思考	方彦婷 / 109

贵州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研究	葛光辰 / 115
贵州城乡跨越的新动力：小城镇的培育	唐 佩 / 120
贵州社会事业跨越发展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周 兵 / 125

社工理论与实务

社会转型期 90 后青年大学生婚恋心理的调查	刘 郁 / 133
老年隐婚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贵州省 Y 县老干社区为例	桂海君 / 138
儿童福利院社会工作服务经验与启示——以铜仁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饶吉银, 张 弛 / 145
和谐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工作实务教育	王萍萍 / 152
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探析	杨俊峰 / 156
为流浪儿童点燃人本温暖之火——社会工作介入流浪儿童救助	孙美华 / 161
“生态系统”理论在自闭症家庭中的社工介入——以实习机构中自闭家庭个案为例	张秀娟 / 165
小组工作介入大学新生适应之研究——以大学新生成长小组为例	罗云南 / 170
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与介入——基于贵阳市 N 机构对餐饮业服务员的社工介入	李 瑜 / 176
农村丧偶老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基于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范贤昱 / 181
青少年网络成瘾治疗模式的实证研究	张亚杰 / 187
高校开展朋辈辅导的作用探析	张松群 / 192
优势视角下机构内寄养儿童的抗逆力研究	孙广超 / 198
贵州大学学生生命教育与宁养服务认识状况研究	蒙 霜 / 203
旁观者效应的解读及其破解——攻破心灵深处的逃避主义	李婷婷 / 209
寄宿初中生心理健康研究	张 莉 / 215

社会管理与实践

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研究——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为例	王红梅 / 225
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基于“贵阳模式”	杨红英 / 231
论风险社会中的社会管理	李国和 / 237
地方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动向及趋势研究——以瓮安县政府为例	唐正繁 / 243

新形势下贵州产业园区选址的经济社会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徐和平 / 250
贵州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差异性分析·····	黄 丹 / 254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办好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	田宗远 / 259
贵州民族地区出生缺陷防治机制问题研究·····	胡 晓 / 264
浅析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以松桃县太平营乡为个案·····	罗俊松 / 269
贵州民族地区政府公共服务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张 瑜 / 276
我国发展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罗 荣 / 282
贵州省总工会 2011 年度职工素质建设工程述评 ·····	俞南平, 王 彬, 石书琦 / 288
推进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路径探析·····	常进锋 / 295
我国城市社区直接选举问题探析——以安顺市 122 社区为例·····	刘欢欢 / 300
贵阳市统筹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	韦 淇 / 306

文化传承与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贵州民族文化的际遇与出路·····	张定贵 / 315
屯堡社区生活史探微——对双堡市场碑的考析·····	吕燕平, 吴 羽 / 322
浅议荆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王小艳 / 327
农村家庭人口文化建设及意义·····	韩 旸 / 331
当代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郑州市某高校为例·····	黄 兴 / 335
酒桌礼仪视角下的黔西南州农民交往模式·····	刘 超 / 340

“三农”问题

城镇化背景下: 贵州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路径思考·····	黄德林 / 347
基于农民选择意愿下的贵州人口城镇化研究·····	杜双燕 / 352
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研究回顾与前瞻·····	王武林, 高圆圆 / 358
贵阳市部分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基于社会工作的视角·····	刘卫星, 汪惠惠 / 364
贵州民族地区留守妇女生存现状研究·····	罗贤贵 / 376
贵州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对策·····	刘玉连 / 383
养老: 农民工靠什么·····	汪惠惠, 黄 萍 / 389
浅谈学校关爱与服务留守儿童的现状及对策·····	王绍文 / 396
浅析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的现状及限制性因素——以广西 A 村为例·····	蒋桂东 / 400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措施研究——以贵州省务川县石朝乡小池组为例·····	赵 曼 / 405
关于贵州农民工家庭实现全面小康的研究	
——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工正汽配厂的贵州农民工为例·····	唐 凯 / 410
浅谈多重因素制约下农村扶贫、惠农项目的运作——以贵州省 W 县为例	
·····	王一帆 / 415
浅谈贵州农村贫困的原因及其对策·····	陈清婵 / 420
隔代教育对农村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探究·····	陶 顺 / 425
农民工医疗保险现状调查研究·····	郑 鑫 / 430

生态文明建设

“加速发展、加快转型”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安和平 / 437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学思考·····	罗玉达，李治邦 / 443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	张 婧 / 452

社会组织研究

贵州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发展障碍的个案研究·····	庄 勇 / 459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研究·····	马良灿 彭 怡 / 465
“两加一推”背景下公众眼里的贵州妇联组织·····	周芳苓 / 470
我国社区民间组织发展问题及对策探讨·····	李 丽 / 476
贵州民间慈善组织发展障碍探究·····	刘 楠 / 481

社会学理论发展与创新

我国农村女性高自杀率的社会文化因素辨析

李建军*

中国是世界上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自杀统计数据的所有国家中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中国女性的高自杀率主要因为农村女性自杀的大比例。自杀的原因多种多样，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既要考虑历史文化因素，也必须考虑社会因素以及精神疾患有可能同时成为自杀的主要原因。各种因素有可能同时存在或相互作用而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考察形形色色的自杀案例，在某些案例中有社会压力的因素却没有精神疾患的因素，而一些案例却仅有精神疾患的因素而没有社会压力的因素，而更多的案例却是两者并存并相互作用所致。

因此，把当代中国女性自杀率偏高的原因归结于单一由“社会转型”引起显然是不科学的。更趋于合理的方法是考虑心理因素（内因）与社会因素（外因）的相互作用而导致自杀，女性的精神疾患可看作由于社会压力引起（包括社会转型引起）的心理状态（家族式精神病遗传除外），而女性的精神疾患率增高也会加重对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压力（传媒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限制了个人应付应激状态的能力。

中国女性自杀率高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各国的社会学家一直都在探究其原因，但所有理由似乎都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下面先就 2001 年前比较流行的中国女性高自杀率原因假说进行简要述评。其主要观点集中见于第五届“全国危机干预暨自杀预防研讨会”会议学术交流资料汇编（2001 年 5 月，长沙）。

1. 我国两性差别的明显存在与女性地位低下。

此说过于主观和片面，难以完全成立。当今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从纵向看，中国女性的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最高时期。“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封建的纲常伦理被视为历史的垃圾，尤其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

* 李建军，贵州省社会学学会会长、安顺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当家作主”，妇女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至少在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内是被公认的。可是，中国女性的自杀率却是居高不下，而妇女地位比中国低得多的伊斯兰国家的女性自杀率却比中国低得多。

2. 我国传承千年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在作祟。

此说也非中国妇女自杀率高企的绝对因素。毋庸讳言，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已作为一种内化的文化遗传基因而代代相传，但将其夸大至是造成中国女性义无反顾地选择自戕的文化动因显然是言过其实。如韩国、日本及伊斯兰国家妇女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同样根深蒂固，但其女性自杀率却比男性低得很多。

3. 中国女性普遍忽视心理卫生。

此说难以成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心理卫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已进入中国小学生的课堂，中国的高等学校已普遍开展了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工作。当然，在广大的边远贫困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心理卫生问题仍亟待解决，但与落后的非洲等国家相比，此说难以服人。

4. 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缺损，必要的救护设施和专业人员匮乏。

此说对中国女性的自杀既遂率高有一定说服力，但公共卫生体系及救护手段等方面，非洲等地区的落后国家比中国更为缺乏，可这些地区的女性自杀率却大大低于中国。

5. 我国已婚女性的离婚率上升。

此说完全不能成立。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离婚率比中国高得多，而女性自杀率却相对要低。

6. 中国女性性压抑。

此说更缺乏证据。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开放，中国女性的性观念已有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就横向比，伊斯兰国家女性的性开放程度最低，但并没有导致自杀率的高企。

7. 我国高毒农药的广泛使用。

以服农药为主要自杀手段的确是中国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主要自杀手段。在我国农村，农药唾手可得也为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男性也同样极易获取高毒农药，为何男性自杀率又相对女性较低呢？针对女性比男性自杀率高的问题而言，此说不能完全成立。

8. 中国女性过度辛劳。

中国女性的勤劳既是传统本分也是美德，但将女性的劳累归结为女性高自杀率的

原因显然不能说服人。

9. 中国女性肩负着双重责任：生产劳动与生育奉养。

女性负有劳动与生育双重责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性别分工，不具有特殊性，此说也完全不能成立。

10. 中国女性面临着男性自杀的问题。

此观点显然近乎荒谬。女性自杀更能博得男性的同情，在男性面前抗争，中国女性的传统作法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11. 中国女性的生理学特征。

此观点也缺乏科学依据。持此观点者（主要为西方学者）提出，中国人群中是否有女性男性化的心理、生理变化趋势，为何中国的体育运动及国际比赛中总是阴盛阳衰？

12. 中国女性的心理学特征。

持该观点者（主要为西方学者）认为，是否中国女性更趋于具有攻击性？此观点也显然近乎荒谬。

13. 中国女性的精神问题和抑郁症。

就抑郁症而言，各国也均是女性高于男性，可其他国家自杀率又都是男高女低，此说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14. 中国女性就情绪而言好冲动。

考察中国女性自杀的实际案例，不难发现“冲动型”案例较多。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病情较重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前考虑自杀的时间是：37%不超过5分钟，46%不超过10分钟，60%不超过2小时。也就是说，近一半（46%）的自杀者考虑生死的时间在10分钟之内^①。郑荣昌等调查农村女性自杀死亡案例发现，属“冲动型”自杀的占50.7%^②。

15. 中国女性社会化程度和社会支持的差别。

此观点有一定道理。中国女性由于性别差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社会化过程不完善，不少人除家庭成员之外，社会交往不多，在情感上容易陷入孑然无助的境地，对女性的社会支持度显然不够。而西方女性社会交往较多（如朋友较多），社会支持度明显高于中国女性。

16. 中国女性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失范”(anomie)。

① 李鸿谷、赫利琼：《中国人自杀状况调查报告》，2002年12月13日《三联生活周刊》。

② 郑荣昌等：《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女性一直被禁闭于家庭之内,家庭人伦关系、遇人的淑与不淑对她们至关重要。世世代代以来,大多数中国女性默默地生,在几近麻木的状态下受尽生活的磨难之后再默默地死,以一种看不到尽头的无限轮回的方式活着、死去。至于一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封建的女英豪,她们义无反顾、一飞冲天所举的叛逆旗号也只是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等,还没有人敢奢谈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一旦背离了家庭与社会,也就凄壮地走上了绝路。她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即使再激烈、再彻底,其最高目标所争取到的只不过是自由选择一个自以为值得信托、足以终身依靠的伴侣,并未能摆脱依附于男人、做男人附属品的地位,而为此,她们往往要付出捐弃生命的高昂代价——殉情而死。但是,当今中国女性在受教育程度、性别角色地位、社会参与度、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幽闭于家庭之内、仍当男人附属品者毕竟已不太多了。

上述假设因素中,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国家虽然没有呈现出中国式的男女自杀比例(女高男低),但也都存在着1—6项相似的因素,7—10项因素被认为是中国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下所特有的,而11—16项因素则具有不确定性,其假说尚有待于求证(张杰,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美国)。

费立鹏(Michael. R. Pillsps)、刘华清、张艳萍等人提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社会剧变与动荡,自杀率也随之波动,所以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也会影响自杀率^①。他们提出,过去10余年中国报刊上的自杀报道都把社会变革——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自杀联系起来,这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如下方面:

一是由于经济活动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市场经济导致个人与家庭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增大;

二是婚姻中不贞与离婚率增高,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受挫的可能性增大;

三是酗酒、吸毒等,边缘性自杀的比例大增;

四是随着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和医疗费用的大幅度增高,使一些患者无力承受,进而采取消极的办法——拒绝求治的“边缘性自杀”手段;

五是婚姻纽带的松弛、家庭关系的弱化造成个体(尤其是青少年女性)得到家庭成员关怀的程度降低;

六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使得居家的

① 费立鹏、刘华清等:《中国自杀状况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载《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1999年版,第219页。

农村女性（担负农村家庭抚育、奉养的重任）受挫的可能性增大；

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社会分配不公，以及社会分层、社会地位等级日趋森严，使得相当多的社会公众对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地位高度不满。

上述社会问题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变革互为因果。但是，我们也不能讳言这些社会问题是伴随着中国的剧烈的社会变革而更加凸显。如果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社会问题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自杀或是引起精神疾患而导致自杀，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是中国当下出现高自杀率（尤其是女性）的社会原因之一。

但是，并不能由此简单地断定当前中国的自杀率就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要高（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根本无自杀统计数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普遍存在周期性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各种突出的社会问题，诸如连年的战争、外来侵略者的奴役与掠夺、民众的赤贫、灾荒、瘟疫、国民素质（身心）的整体低下等等，就国民的生存状况而言，根本无法与当代同日而语。可我们对那个时代国人的自杀状况几乎一无所知。

就与当代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还要滞后、公共卫生体系更加缺失、社会动荡激烈的国家（如非洲、中东、拉美一些国家）的自杀率却远比中国低。因此，仅从社会变革上寻找自杀的社会原因显然是片面的，用其他诸如历史文化等因素来解释当代中国较高自杀率（尤其是女性）似乎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我国农村女性自杀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据费立鹏等调查，中国农村女性自杀死亡人数年均高达17万人以上，自杀女性主要是集中于15~39岁年龄段，约占农村自杀女性总人数的57.3%，占全国自杀总数的31.0%。其自杀死亡率为同龄城市女性的4.7倍，同龄城市男性的4.9倍，同龄农村男性的近2倍^①。

有资料显示，我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出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降，二是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左右。针对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原因，文中的分析着重于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即我国境内大批农民离开乡土到城市务工。民工潮包括农村女性的广泛参与。近几年，女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人数每年有4000万之多。农村女性的大规模迁移规避了三种既往的自杀风险，即农村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既往的家庭纠纷、既往的自杀工具。所以，农村女性的迁移是分

^① 郑荣昌、费立鹏等：《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析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关键之一^①。

应该注意到,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忽视个性的张扬,以依附、屈从为特征的女性人格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濡染,仍影响着今天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促成了中国妇女人格中的内倾性和自虐性,这决定了她们在充满自我牺牲和忍辱负重的生活中润物无声、日积月累所积蓄的攻击性极易内倾化,即以最极端的方式——自杀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古代中国,由于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大多数妇女只能默默地生、又默默地死去,青史留名的女性可谓屈指可数。但自杀殉节的“烈女”却在封建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史书所载,节妇烈女在宋以前不足百人,宋以后也就百位数,而明清时期已是万人以上。在安徽歙县,光是妇女的贞节祠堂就有六千座之多,坊更是不计其数^②。

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格经历了剧烈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荡涤,既是封建传统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剧变,也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互作用的结果,更是农业社会意识和工业社会现实并存的结果。三种历史转型的总和导致中国妇女的人格可能出现多重分裂。

近代以来,我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促使农村妇女长时期地陷入激烈的矛盾状态之中。当然,妇女解放作为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早已彪炳史册,不容置疑。但是,没有思想启蒙的铺垫和经济基础、似乎是一夜之间的“妇女翻身解放”及其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女性人格的分裂。中国主流政治文化极力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移风易俗”,致使女性“自主意识”空前提高。但是,沿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一株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大树,具有超稳定结构,近代中国革命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时,还未及彻底颠覆数千年来形成的中国对女性的历史定位。

因此,中国妇女解放的“未预结果”可能就是:“不少农村女性处于一种‘不男不女’‘半男半女’‘似男似女’的人格和性格的分裂状态。这样,女性就在社会的‘现代’与家庭的‘封建’,进而又在家庭的‘现代’与社会的‘封建’中挣扎。‘脱序’在挣扎中产生,自杀(行为)在‘脱序’中完成。”^③成年女性承受着家庭主妇和社会主人的双重负担。“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使得不少妇女性格从

① 景军、吴学雅、张杰:《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

② 叶玉琴:《关于传统女性观的几点解读》,载《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6年第6期。

③ 李斌、左格尔:《脱序型:中国农村女性自杀原因探究》,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80页。

“柔性”走向“刚性”。但刚性易折，碰到委屈或重大负性事件时往往以死表示抗争，而不是像旧时代那样逆来顺受、忍辱负重。

更为特殊的是，中国的农村女性，由于具有“农民”——“妇女”的双重角色，就可能使她们遭受到双重歧视。作为女性，可能会有性别歧视；作为农民，难免会有身份歧视。她们的身份与性别，似乎天然地注定了其“弱势群体”的地位。假如农民和妇女在中国是一直备受关注的老问题，那么，农村女性不幸地集中了两者的所有窘迫境况。婚姻、生育、家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最大限度地占据了中国妇女的生活，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

“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句话概括中国农村女性的命运尤为贴切。她们的不幸还在于，既不能逃离更不能改变既定的生存困境。没有良好的文化教养，缺少足够的生存能力，习惯于服从而未获得自主个性、独立人格，这些都是农村妇女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严酷的是，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生存环境，本身就使中国广大的农村女性几乎先天地失去了走出困境的可能^①。

我国农村妇女群体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事实上的缺失和不平等，也直接导致了这一群体整体素质的普遍低下和主体意识、价值观念的或缺。据统计，2000年，我国成年女性文盲人口为6181万，占全国文盲人口总数的70%，而在这庞大的女性文盲中，农村女性约占80%。另据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统计，农村女性文化程度高中以上为8.5%，比农村男性低6.9个百分点；初中以上比例为41.3%，比男性低21.8个百分点；女性文盲率为13.6%，比男性高9.6个百分点。

以土地承包权为首要内容的财产权在事实上的缺失和不平等，是我国农村妇女群体高自杀率的重要物质根源。如果说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事实上的缺失和不平等，为我国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提供了主观心理条件，那么她们的以土地承包权为主要内容的财产权在事实上的缺失和不平等则为这一群体的高自杀率提供了客观物质根源^②。

我国农村女性的高自杀率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城乡女性的社会角色、社会组织形式、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城乡之间的社会环境、文化教育水平、劳动条件、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① 许明：《农村妇女：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载《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序，第3页。

② 刘斌：《农村妇女群体高自杀率原因探析》，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第65页。